

中国货币史上的用银转变： 切片、称重、入账的白银*

黑田明伸

内容提要：中国的银两是称重计量的，最初被作为丝绸（用于远距离贸易的支付）的辅助性手段。元代发行官钞，面额以铜钱单位标示，但按银重计价。明代赋役征银后，大量银条从日本及南美流入中国，用于交换丝绸、瓷器以及茶叶，民间买卖日常必需品的一般交易也用白银结算。18世纪中叶，铜钱（乾隆通宝）供应量加大，并被用于本地货物买卖，银锭则用于远距离交易，与铜钱形成了互补性结构。不同于现代常识，铜钱与银锭不固定的关系以及本地商人过账时所用的称重虚银两单位，对本地经济起到了稳定作用，亦能对抗动荡的区际贸易。

关键词：银两 绢帛 官钞 铜钱

序 言

古今中外，钱就是钱，白银虽为珍贵物料，但并非一直都被用作货币。白银在交易中的使用方式既因文化而异，也因时而变。普通百姓日常交易中实际流通的货币与用于远距离交易结算或作为贮藏手段的货币，二者的货币功能区别甚大。历代社会都各有一套让两种货币相辅相成发挥作用的组合方式。^①在传统中国社会中，铜钱在绝大多数时候都被用作法定货币，具有前述第一种货币功能，但不大胜任第二种货币功能。一般来说，中国政府将铜料铸成铜钱，却未将白银铸成银币。未铸成货币的白银难以满足第一种货币功能，尽管其也能用于日常交易。近年发现了一块纪年为1250年的金属钞版，用来印刷以丝绸标示面额的纸钞，^②证明13世纪中叶丝绸仍被当作货币使用。事实上，白银仅仅是丝绸的替代品，而非取代铜钱。因此，本文将探讨丝绸和白银在远距离交易结算时，以及在中央政府向地方征税和地方政府之间税收调动中所扮演的角色。

中国货币史上有世界其他地方罕见的三大特征：其一，用作流通的白银不是计枚（锭）核值，而是称量计算。其二，用贱金属（铜合金）而非金或银来铸币；其三，国家发行纸币的广泛流通远早于其他国家。只有厘清三大特征之间的关系，才能准确把握与白银相关的中国货币史的特点。

早在公元前3世纪秦王朝建立之前，依赖贱金属铸币的做法便已出现。以铜钱充当购买日用品的交易媒介非常方便，但铜钱笨重，难以用于远距离贸易结算。因此，从西汉至唐代，丝绸充当了跨区域贸易的结算货币。五代十国时期，国家用锡、铅、铁等贱金属大量铸造钱币，并任由其用于本地

[作者简介] 黑田明伸，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日本东京，113-0033。

* 本文是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基金“世界史における交換の多様性と貨幣の多元性についての国際共同研究”（编号：19H01510）资助的成果之一。笔者感谢封越健教授协助查阅账簿资料，刘伟娟女士翻译英文稿，何汉威教授、熊昌锬博士改订中文稿。笔者也感谢汉学研究中心对项目“再议中国货币史——从货币之间的互补性来看”的支持。

① 关于各种货币之间互补的概念，见 Akinobu Kuroda, “What is the Complementarity among Monies? An Introductory Note”, *Financial History Review*, Vol. 15, No. 1, 2008, pp. 7-15.

② 高聪明：《“淄州交会”考》，《中国钱币》2016年第1期。

交易。这种官方铸币的二元结构影响了中国货币史后来的走向。11至18世纪间铜钱铸造量显著增长,但每一时期产量又有不同。11世纪,铜钱铸造量已达最高峰,18世纪达到次高峰。相较之下,15世纪时却几乎没有官方铸币。此外,国家发行的铁钱于11至12世纪间扮演了重要角色。各省市面流通的多种铁铸通货因笨重而难以长途运输,实在不便于跨区域流通,这也成为日后国家发行纸钞的重要背景。宋元政府为了保证纸钞的接受度,将其限制在特定区域内流通,并规定其使用期限,过期的旧钞须换成新钞使用。相比之下,金代和明代政府发行的纸钞不设地域限制和使用期限,因此民众接受度不高。^① 大体而言,中国历朝政府都没有使用贵金属铸造货币。称重计算的白银成为大众偏好的交易结算手段,16世纪以后尤为明显。明清政府用称重白银征税,但不铸造用于流通的银币,这是源于古代将丝绸用作货币的惯例。18世纪末,银元开始在东南沿海地区流通。整个19世纪,银元在华南地区被普及使用。至民国时期,中国正式创建了以银元为基础的货币体系。不过,银两(称重的银)和银元(计数的银)之间的比价每个城市都不同,而且每天都有起伏,反映出两者各有不同功用。

本文将追溯在中国称重计算的白银如何不同于其他文明,成为主导的交易货币,最后却渐渐衰退。中国商业依赖称重白银制度,揭示出现代人对货币认知的一大误区,即假定货币有交易媒介、计价单位、存储价值三位一体的功用。

一、中国早期以银两补足丝绸的功用

在秦朝建立之前,楚国曾发行方形金币,其出土范围覆盖当年楚国治下的大部分领土。而几乎在同一地域内,也发掘出楚国的贝形铜钱。可以推测,在楚国统治下,人们将金币与铜钱相互配合使用进行交易。河南扶沟县(曾为楚国领土)的一处汉初遗址曾发掘出18块银布币,和数枚典型的楚国形制的金币,可以认为这些银币布也是由楚国铸造的。^② 除此之外,截至目前,中国古代遗址再没有出土过银币。

西汉时期,汉武帝曾尝试建立银币制度。若《史记》中的记载属实,这项政策可谓19世纪末以前,传统中国颇为严肃地铸造银币的尝试之一。^③ 秦朝尝试发行半两钱的铜钱,结果以失败告终。直至西汉发行“五铢钱”,传统中国才有了真正流通全国的货币。汉武帝成功推行统一的单一单位铜钱,但未能发行如前述的银锡钱币等高面值货币。另一例外情况是新朝发行的“朱提银”,像王莽发行的其他货币一样,两种分别相当于1000枚和1580枚铜钱的银币实在不太可能同时流通于市面。

自东汉起,中国历朝几乎从不使用贵金属铸币。唐代政府有时会发行银币,但其用以奖赏功勋,并不被用于实际流通。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无证据显示称重银曾在统一国家创建前和成立初期使用。因此,中华文明起初并未确立以称重银为货币的惯例。白银只被用于装饰,未体现出货币功能。至汉代,丝绸被用作货币的功用被进一步强化,尤其是为了与游牧民族交换马匹,丝绸变得尤为重要。及至唐代,白银开始在一定程度上承担起丝绸的货币角色。政府实施两税法,规定赋税须以铜钱缴纳,实际上私铸铜钱盛行,主导了基层交易。

五代十国时期,各国竞逐相争,各地涌现不同货币,解决跨地域交易的方法应运而生。宫崎市定强调了白银于跨国交易中扮演的角色。^④ 虽然没有资料能够清楚证实宫崎的主张,但对比最为游牧民族欢迎的交易商品——丝绸,白银有可能更适用于中国境内的远距离贸易。

北宋年间,铸造银锭比以往更加频繁,反映出白银正在成为流行的货币形式。11世纪中叶,银锭

① 金朝最初发行的纸钞设有七年流通期限,但之后废除了这项规定。《金史》卷48《食货三》,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73页。

② 郝本性、郝万章:《河南扶沟古城村出土的楚金银币》,《文物》1980年第10期。

③ 《史记·平准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427页。

④ 宫崎市定『五代宋初の通貨問題』星野書店,1943年。

生产与铜钱铸造一同增加。^① 值得注意的是,用银两结算的交易在整个宋代仍然罕见。南宋时期,官方发行的纸钞成为主导性货币,朝廷会支付白银来回收用铜钱单位标示面额的旧钞。金朝是中国历史上首个以银为货币计价单位的政权。然而,推行以银为货币的计价单位的做法,并不意味着银被广泛用于收税或购物。金朝发行银币,但未能让白银流通于市面,且很快被停止使用。

二、纸钞作为按银重计价的货币

元朝统治初期已发行银币,但征服囤积大量银锭的南宋后,其货币政策转而依靠使用称重计算的银。元代禁止私用白银,并废止此前通用的铜钱,还发行了数量可观的纸钞。纸钞的面额以铜钱单位标示,但政府用银重计算钞价。所以从朝廷角度来看,不必实际流通银锭,按银重计价的纸币即可盛行于各地。^② 于是,丝绸在中国历史上用作货币的功能终于消亡。

元代远不如中国历朝那样依赖田赋,它十分倚重从商业活动中征收的税收,如从盐专卖获得的收入是元代统治的最重要支柱。民众可以用官方发行的纸钞缴交盐税,尤其是用“中统钞”。但官钞不能兑换成铜钱或银锭。更重要的是,虽然元代有充足的白银存量,但国家禁止私用白银交易,直到1311年才取消了私用白银交易的禁令。银锭通过官方转账或私人贸易,沿欧亚商队的贸易路线流通。^③ 不过元代覆亡后,可能致使不少白银仍留在中国内地。

三、称重计算的银代替官钞

1375年明代确立官钞制度后,禁止私人交易使用金银,直至1436年废除禁令。洪武年间,政府允许民众以白银代替纸钞交税,目的在于吸纳民间私用的白银。永乐及宣德时期则没有允许用白银交税的官方记录。长江下游和东南沿海省份的田赋向来以纸钞缴交,但1436年突然改用按称重计算的白银征收。这就证实明政府倾向用银征税已是不可逆转。但这项政策推广得并不迅速,以纸钞交税的情况仍然存在,且直到16世纪初内陆关税才改用白银缴纳。大略言之,15世纪末私人交易中用称重的银定价已十分普遍。明政府渐渐放弃贬值的官钞,加速了采用白银的步伐。1508年,朝廷宣布官员的俸禄九成以白银支付,一成由铜钱支付。可见即使在行政管理体系中,官钞的历史角色也已经完结。^④

赋税制度变革如何影响私人交易中货币的实际使用?对于此,当时地契中所用的货币单位提供了重要线索。用什么货币单位来确定地价,必然与如何征收田赋存在莫大关系。北宋年间,出售土地的契约中是用铜钱结算的。^⑤ 但13世纪时,大部分土地契约都指明要使用官钞支付。元代沿袭了这一习惯,多数地契以中统钞作为主要付款方式。^⑥ 与前代史料零碎的情况不同,明代徽州等特定地区的土地买卖记录较为充足和连贯。徽州地契揭示了明初的土地买卖是用官钞议付的,但从15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土地买卖契约已统一使用称重的银。福建南平的地契也显示出同一趋势,1401年至1431年间的3张地契显示是以纸钞支付,1501年至1638年间的5张地契则指定以称重的银付款。^⑦ 于是,明代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能够稳定经济、却没有发行征税用的货币的朝代。出乎明政府的预想,华

① 王文成:《宋代白银货币化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8-46、143页。

② Akinobu Kuroda, "The Eurasian Silver Century, 1276-1359: Commensurability and Multiplicity",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Vol. 4, No. 2, 2009, pp. 245-269; 黑田明伸著,高聪明译:《欧亚大陆的白银时代(1276—1359年):可公度性和多样性》,《思想战线》2012年第6期。

③ 关于中国本部采邑向西部汗国封地缴纳的贡金,见黑田明伸著,黄丹丹译《欧亚白银重探——钱币学上的新发现》,《澳门研究》2017年第4期。

④ 关于明代政府的货币政策,见市古尚三《明代貨幣史考》鳳書房,1977年。

⑤ 王仲萃:《金泥玉屑丛考》,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412-413页;余耀华:《中国价格史》,中国物价出版社2000年版,第635页。

⑥ 章国庆:《天一阁明州碑林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37、42页;安徽省博物馆编:《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1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5页。

⑦ 福建省钱币学会:《福建货币史略》,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56页。

南出产的丝绸和瓷器(以及后来的茶叶)出口到日本,后来更输出到拉丁美洲和欧洲,中国得以吸纳大量白银。而16世纪40年代起日本石见和16世纪70年代起秘鲁波托西满足了中国对白银的需求。从16世纪末至17世纪,秘鲁首都利马每年都输入价值200万比索的丝绸和陶瓷。^①据估计,1600年至1645年间中国每年流入白银115吨,^②全球开始了以银换丝的新纪元。明政府后来实际上废除了以力役和实物为基础的管理政策,并在没有发行白银货币的情况下,统一用白银征收赋税。因此,白银的角色从宋代作为丝绸的辅助性手段,经过元代按银重结算的货币的过渡期,至明代取代了官钞,成为主要货币。

四、白银与铜钱相辅相成的制度

1546年,出使明朝的日本船队在定海停泊,记录了从当地所购物品的价格,它们都是用银重标示的。与1468年另一使团的记录形成强烈对比,该使团在同一港口购入的货物是以铜钱标价的。^③16世纪后半叶,华南沿海地区通过丝绸和其他商品交易吸纳了大量白银,交易模式遂改以白银结算为主。地方志记载以前没有人见过银子,现在每户人家都拥有剪银片的剪刀和称银子重量的秤。18世纪初,用称重的银结算交易在扬州非常普遍,民众将银片剪成小片,小的可以用来买菜。^④包世臣忆述1780年前后徽州已没有铜钱流通,民众即使买菜,也是用银片支付。他还描述菜贩随身携带称银子重量的秤,小店甚至还配备工具,熔化买卖所获的银片。^⑤然而,徽州也是最后一个于日常交易中保留切银称重习惯的地区。

1750年至1775年间,铜钱取代白银被用作地方上的主要通货,包括徽州在内的长江下游的江南,就是经历这场变革的典型例子。随着铜钱流通愈来愈普及,最终连土地买卖也用铜钱成交。“乾隆通宝”是中国历史上供应量第二大的官铸铜钱,日常交易以银片支付的方式逐渐消失。^⑥明清两代将近600年的历史中,官铸铜钱成为最重要的近距离交易媒介,这个说法一点也不夸张。虽然清代以银锭交税为原则,但大部分农民都用铜钱交纳,再由经办机构兑换成称重白银。白银与铜钱的比价因时因地存在较大差异,铜钱与白银形成的互补结构也扎根于此,即铜钱用于本地买卖,称重的银则用于跨地区交易。地契中呈现的货币单位转变,也证实了铜钱与白银形成互补通货的趋势。尽管15世纪前土地价格偶而以谷物和布帛为单位标示,但16世纪中叶后,称重的银已几乎通用于所有土地交易。然而,18世纪中叶起,铜钱再次出现于土地交易过程。19世纪时,铜钱还成为多个省份土地交易的主导支付工具。当然,在土地交易过程中究竟使用铜钱还是白银,各地表现得不尽相同;在北京等大城市以及徽州等特殊地区,白银依然占据主导地位;^⑦甘肃清河州则多用铜钱;迟至19世纪50年代,贵州清水江亦以铜钱为最主要的支付方式。^⑧另外,虽然18世纪末福建等华南沿海地区开始

① 黒田明伸『中華帝国の構造と世界経済』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4年,131頁。

② Richard von Glahn, “Money Use in China and Changing Patterns of Global Trade in Monetary Metals, 1500 – 1800”, in Dennis O. Flynn, Arturo Giráldez, and Richard von Glahn, eds., *Global Connections and Monetary History, 1470 – 1800*, London: Routledge, 2003, p. 190.

③ Richard von Glahn, “Money Use in China and Changing Patterns of Global Trade in Monetary Metals, 1500 – 1800”, in Dennis O. Flynn, Arturo Giráldez and Richard von Glahn, eds., *Global Connections and Monetary History, 1470 – 1800*, pp. 41 – 48.

④ Richard von Glahn, “Money Use in China and Changing Patterns of Global Trade in Monetary Metals, 1500 – 1800”, in Dennis O. Flynn, Arturo Giráldez and Richard von Glahn, eds., *Global Connections and Monetary History, 1470 – 1800*, p. 37. 17世纪初,荷兰东印度公司雇用了一队瑞士雇佣兵到访中国,观察到中国人将贵金属剪成薄片,再将剪出的片称重交易货品。Yves Giraud, *Voyages et aventures aux Grandes Indes (1617 – 1627)*, Paris: Les Editions de Paris, 1997, p. 185.

⑤ 岸本美緒『清代中国の物価と経済変動』研文出版,1997年,359頁。

⑥ Richard von Glahn, “Money Use in China and Changing Patterns of Global Trade in Monetary Metals, 1500 – 1800”, in Dennis O. Flynn, Arturo Giráldez and Richard von Glahn, eds., *Global Connections and Monetary History, 1470 – 1800*, pp. 41 – 48.

⑦ 李红梅「清代における福建省の貨幣使用実態:土地売券類を中心として」『松山大学論叢』第18卷第3号,2006年,131 – 173頁。

⑧ 贵州民族文化宫编:《贵州清水江流域明清土司契约文书·九南篇》,民族出版社2013年版,第130 – 135页;贵州民族文化宫编:《贵州清水江流域明清土司契约文书·亮寨篇》,民族出版社2014年版,第192 – 196页。

用外国银元进行土地交易,但大部分土地交易已由 18 世纪中叶的用银支付改为用铜钱支付。

由此看来,北宋盛行用铜钱买卖土地的做法在清代覆亡前一个世纪得以复活,成为不动产交易中的主要支付方式。宋、清两代的关键差别在于宋代以铜钱征税,而清代则用银的重量计算税款。宋代土地价格与官方支付的货币相联系,而清代土地价格则不用官方的交易货币标示。清代土地价格和官方通货相分离带来的问题是:由于将白银兑换成铜钱手续繁琐,故地方经济活动可能会给朝廷带来棘手问题,即地方无法提供足够的铜钱来兑换大量突如其来的白银。鸦片战争中,清军即陷于如此窘境:“曹娥江虽属孔道,而居民数百家,无大市集。自各路兵勇札营后,日用所需数倍其价,市侩居奇,又必欲以钱交易。兵勇持银入市,被欺尤甚。将军闻之,特饬支应局开设随营钱店,四标以元胜亨胜利胜贞胜诸名。兵勇领饷银,先以店中易钱,始入市市物。”^①

无论如何,18 世纪时,中国形成了铜钱用于当地交易、称重的银用于跨地区贸易的货币分工。这种双重结构非常重要,为区域经济面对远距离市场带来的波动提供了缓冲区。也就是说,一种货币做到另一种货币难以完成的事,反之亦然。搭配使用多种货币自然可以实现单一货币难以完成的任务。1820 年至 1850 年间,以银计价的铜钱跌价近半,当时正值大量白银从中国流出。可以肯定的是,由于白银流入减缩,商人更加需要依赖账簿转账,以在同一城镇进行多边对销贸易。^② 这对于区域内的近距离交易是否也产生了影响? 在安徽屯溪,当地的很多宗祠每年都会于清明节举行祭祖大典,并在账簿中记下为祭典所买物品的价格。这些记录便于后世按年追踪价格趋势,且无须调整季节周期。图 1 显示,虽然铜钱兑换白银严重贬值,但 19 世纪 40 年代结束前,按铜钱计算的米价几乎与 19 世纪 20 年代初的价格一样。米、豆等粮食是用铜钱支付的,而外地商品则用白银支付。因此,白银升值必定对购自远距交易而来的商品形成阻碍。而且当时以白银征税,白银短缺令民众难以承担。相较于远距交易,农户从事近距离买卖的比率高多了,近距离买卖维持稳定的价格走势,一定有利于普通农民。



图 1 安徽屯溪的年度米价走势

资料来源:《金山祀会收支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祀 36 函 549。

说明:米价按每 5 升来计算,单位为文钱。

除了白银与铜钱没有固定关系外,白银的各种使用方式也值得注意。1783 年,户部的白银库存达 8 400 万两,超过户部每年所收 1 300 万两的 6 倍。^③ 清廷每年的总支出估计为 3 500 万两左右。^④ 然

① 贝青乔:《咄咄吟》卷上,文海出版社 1968 年版,第 15 页;岸本美绪「十九世紀前半における外国銀と中国国内経済」豊岡康史、大橋厚子编『銀の流通と中国・東南アジア』山川出版社,2019 年,114 頁。

② 关于同一城镇商人之间的账簿转账,见 Akinobu Kuroda,“Strategic Peasant and Autonomous Local Market: Revisiting the Rural Economy in Modern China”,*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15, No. 2, 2018, pp. 195 - 227.

③ 史志宏:《清代户部银库收支和库存统计》,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41、174 页。

④ 南滿州鉄道株式会社經濟調査会编『清朝経費の研究』南滿州鉄道,1935 年,第 71 页。

而,清廷累积的银条与民间贸易流通的白银并不兼容。虽然两种银子可以兑换,但是以不同的计价单位来使用;即使单位名称同样是“两”,政府的“库平两”和商人使用的“两”也是根据反映供需的浮动比价来互换。清廷累积的大量白银不能直接流入私人市场系统。只要茶叶、瓷器、丝绸等产品可以从交易中吸引白银流入,中国商人就能从对外商的贸易顺差中累积白银;只要民众能够制造这些贸易顺差,清廷便可以收到白银。然而,动产的白银却以不能兑换的方式被贮藏起来。另外,大部分交易结算的银两并非“实银两”,而是“虚银两”。实银两只有平和色,虚银两则包含平(重量)、色(成色)、兑(除数项)3个元素。不同于实银两,虚银两的价值不需要反映银锭本身的供求状况。民众依具体情况使用不同的平、色、兑组合。例如,徽州人詹元相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十月初十日记载其支付情况为:0.7两的常(一种重量单位)平、0.94的色和0.9的兑。兑为0.9,即兑换0.7两虚银两后,可得实银两0.63两。^①又如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代理商曾记载,1820年广州商人将98两的银锭视为100两。曾供职清廷海关税务司的马士(Hosea Ballou Morse)也追溯兑为0.98的“上海两”起源于广州商人。^②

五、入账结算的虚银

清代商人如何使用银子?他们的账簿揭示了银子的实际使用情形。

首先来看河北宁津县的杂货店“统泰号”的账簿。该账簿包含多本专门登记白银收支的簿册,称为“入银流水账”(下称银册),银册记录了多种银锭(有宝银、盐课银、干白银、白银)的进出情况,其中尤以重50两的宝银比例最大。表1列出道光二十一年(1841)十月初一日银册的所有收支项目。有别于其他银锭,每锭宝银进店时均获发序号,每年所收的第一锭宝银就由“1”开始。统泰号收自商铺隆祥号的宝银,是当年进店的第393锭宝银,同一天统泰号又将该锭宝银付予另一商人黄学广。一锭宝银通常重50两,商人会因成色和重量的差异估价升水或贴水。宝银很受欢迎,但不能互相代替。统泰号向隆祥号出售商品,又从黄学广购入货品,第393锭宝银即从隆祥号通过统泰号转移到了黄学广手上。第393和394号两锭宝银进入统泰号时,总值铜钱296050文,再次被用于支付时,总值则记作303060文,并附注“两个月”。另一账簿也反映了收入和支出之间的价差。

表1 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初一日统泰号银册收支项目

入	序号	两	文	出	序号	两	文
隆祥	宝银 393	50	146 262	黄学广	宝银 394	50	303 060
毕同兴	宝银 394	50	149 788		宝银 393	50	
天祥	宝银 395	50	297 560	天祥号	宝银 395	50	302 560
	宝银 396	50			宝银 396	50	

资料来源:《道光二十一年银出入·统泰号》,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屯溪资料·其他地区》,函2-c024。

再看另一种商业公所所用的账簿,该账簿为上海裘业公所记载节庆收支专用,其保留着1868年至1881年间以各种货币单位表示的所有收支。^③每逢节庆,就有一定数量的墨西哥银元换成铜钱,如2银元换成2200文铜钱。当时墨西哥银元通用于上海,但价值过高,不适合购买过节所需的杂货。虽然在很多情况下商人的捐献均以上海两(九八规元)记账,但账册中没有出现过用“两”换算任何货币,而是载有两宗由墨西哥银元兑换成上海两的事例。没用“两”换算通货,即表示没有实银两存在,以银称重的货币单位只是一个概念,方便相关商人作转账之用。

以上两个例子清楚说明了清代中国用银的特色,首先是宝银等各种银锭不能替代互换,即实银两欠缺等质通用性;其次是虚银两没有实物相随,只是商人在账簿中的计价单位,供转账结算之用。

① 黑田明伸『中華帝国の構造と世界経済』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4年,35頁。

② Hosea Ballou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ol. 3, Taipei: Ch'eng-wen Publishing Company, 1966, p. 374.

③ 《可爱堂裘业公所》,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S247-2-6-13。

上海两和重庆两就是以这种方式分别运作于上海和重庆(四川)的商品交易之中,其汇率不一定对应两地之间银两的实际流动情况,而且不同两的汇率浮动与两地银锭的运费无关,此种现象屡见不鲜。

六、东亚各地以银重计价的制度

东亚各地也盛行以称重银为货币,而不是使用计数的银,特别是16世纪充裕的白银流通以后,以银重计价的制度在亚洲扮演了重要角色。

前述提及晚至16世纪40年代,日本已是中国重要的白银供应国。直至16世纪晚期,由于日本出产的大部分白银都出口到中国,换取中国商品(尤其是丝绸),所以白银没有在日本国内被当作货币使用。银条在日本主要被用于藩主之间的馈赠,银片则以“枚”为计算单位。换言之,16世纪日本尚未流行使用称重计算的银。不过,16世纪末日本出现了用以“匁”(即十分一两)为单位的称量白银进行买卖的交易方式,而且于17世纪初迅速在日本西部得到普及。与同时期中国华南地区的情况相似,商人都拥有称量工具,切银片的做法在当时日本西部十分普遍,其历史背景就是用称重的银与中国贸易愈来愈频繁,影响了日本的交易方式。以银重计价的制度终于首次在日本历史上得以确立,并持续到明治维新以前,成为日本西部的主导交易方式。^①然而,日本的称重银两制度与中国的称量方式有一些明显差别。17世纪时,日本部分领地已有银锭流通,不过德川幕府仍然垄断银锭的铸造。^②德川幕府向大黑屋家颁发独家专营特许证,由他们按统一标准铸银,商业中心大坂的商人继续使用称重银计价的制度。而18世纪末,江户幕府开始发行银币,币值相当于八分之一判金。^③日本西部的地方藩主也同时发行以称重银计价的纸钞“藩札”。可见,与中国不同,日本官方当时供应的货币是以银计价的。虽然在明治维新以前的大坂,称重的银换算铜钱的比价每天都浮动不定,但实际上在很多藩主的领地,以银重计价的藩札与铜钱的比价却固定了下来。在很多方面,日本的官方管制对于以银重计算的货币至关重要。

越南的情况与中国较为类似。当地的银锭——“土银”与地方流通的正式银锭相比,成色比较低(含银只有七成),但越南政府会按照银模铸成高成色银锭。整个19世纪,西班牙银元和墨西哥银元等外国银元在越南的流通量逐渐增加。日本却并非这样,外国银元仅于条约港的范围流通,没有流入国内市场。越南的私人交易不受国家控制,引发各种白银货币流入市面。18世纪以前,没有证据表明越南政府曾正式铸造银锭。国家为稳定交易,规定比价固定在1两银换算1200个古钱,否则以银支饷的士兵就会因兑换铜钱而蒙受损失。不过自19世纪起,越南政府在银币发行方面执行了比清廷更为积极的政策。西山起义期间,越南国内流通的银混杂了相当大比例的铅和锡。阮朝创建后,先后于1803、1811和1814年发行了10两的中平银锭、1两银锭和5钱银锭。国家铸造的银锭,按银的重量计算,但实际用起来却以银锭的数量计数。19世纪前半叶,阮朝引进用白银征收的人头税,并推动行政支付白银化。^④越南与中国历朝形成鲜明的对比,正如前文所述,尽管中国已经确立以称重的银为本位,处理征税和支付,但历朝均对发行白银货币犹豫不决。

朝鲜政府将银钱比价维持在1两银兑换200个铜钱。16世纪末日本入侵朝鲜后,银锭终于在汉城流通,中国军队为养兵也带来大量白银,不过朝鲜半岛其他地区没有将白银当作货币用于当地交易。^⑤

日本、越南、朝鲜的用银方式进一步揭示出中国用银的奇特之处:这些国家均跟随中国使用了按银重计价的制度。然而,中国的多个朝代虽然都以称重的银征税,私人交易用银却与官府用银无关。这种双重结构能够形成互补关系,造成中国的货币制度明显有别于东亚的其他国家。

① 关于日本货币历史一般趋势,见高木久史『通貨の日本史』中央公論新社,2016年。

② 关于17世纪日本地方领地性货币流通,见榎本宗次『近世領国貨幣研究序説』東洋書院,1977年。

③ 关于德川幕府铸银政策,见田谷博吉『近世銀座の研究』吉川弘文館,1963年。

④ 多賀良寛「阮朝治下ベトナムにおける銀流通の構造」『史学雑誌』第123卷第2期,2014年,171-204頁。

⑤ 山本進「朝鮮後期の銀流通」『北九州市立大学外国語学部紀要』第136期,2013年,1-27頁。

七、由虚银两估量价值的银元

18和19世纪交替之际,华南沿海地区终于开始使用计枚核值的银元,而非称重计算的银元。例如发生于1810年福建龙溪县的谋杀案,就与换算外国银元有关。“福建龙溪县民赵深渊携番银一元,向林拨钱店换钱,按照时价应钱七百五十文,林拨因银色低潮,短换钱二十文。纠纷致伤赵深渊身死。”^①这场纠纷揭示了民众知道银元与铜钱之间是有标准汇率的,而且会在市面不时遇到成色低的银元。从前述上海裘业公所的账簿可以得知,整个19世纪,华南已经盛行用外国银元进行结算。直至19世纪末,土地买卖开始以银元订约,而且东南沿海地区已经普遍使用价值10分的银币“小洋”。^②特别是东亚国家的港口对外开放后,墨西哥银元支配南中国海的区际贸易。1866年至1868年间,香港曾短暂铸造英国贸易银元,但也无助于将墨西哥银元逐出。^③虽然现今很多人都知道金本位制已于19世纪后半叶风行世界各地,但各国银元的流通其实也一并增加,且在重量和成色方面并无多大差异。表2显示19世纪晚期,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国都发行大量银元,用于国际贸易。^④各种银元中的优胜者是用于东方的墨西哥银元和用于西方的玛丽亚特丽莎银币(奥地利铸造)。前者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主导东亚的国际贸易;后者则于整个19世纪在非洲和中东发挥重要作用,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仍在红海地区流通。^⑤

表2 各国贸易银元的铸造量 单位:万枚

国别	名称	时间	数额
墨西哥	比索币	1874—1903	67 400
奥地利	黎凡特银币	1751—1903	17 600
美国	贸易银元	1873—1887	3 600
英属印度	孟买及加尔各答银元	1895—1903	15 100
法属印度支那	皮阿斯特贸易银币	1885—1903	6 800
日本	贸易银元	1871—1897	16 500

资料来源:A. Piatt Andrew, "The End of the Mexican Dollar,"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8, No. 3, 1904, p. 356.

外国银元盛行,挑战了人们一直以为货币要得到国家保证、人民才会接受的认识。墨西哥在东亚毫无政治影响力,奥地利在非洲和中东也是如此,即使1860年奥地利政府废止玛丽亚特丽莎银币在国内流通过后,其发行量实际上是持续增加的。19世纪初部分国家出现领土型币制,意即施行一套本地同一性的货币,一方面抑制外币在本国的通行,另一方面防止国内伪币的流通。不过,外国银元在某些地方仍然大受欢迎,其流通量在19世纪后半叶仍有增无减。

中国的情况更为复杂,有多种外国银元同时流通,尽管其重量和成色不变,且不同银元的币值也是浮动的。例如,19世纪末长住中国的英国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在其著作中写道:“1899年5月29日,在上海某中国报章载明一枚西班牙银元值九钱三分,但在另一份报章则记为九钱。银元用作钱币,比用作金属时价值超出百分之十六,这种价差也年复一年地稳定持续下去。”^⑥荷兰银行家卫斯林(Gerard Vissering)也有以下记述:“在宁波、杭州或芜湖等较小的对外通商港口,现今西班牙银元广受欢迎。虽然西班牙银元比墨西哥银元轻,但由于需求大,1西班牙银元能兑1.4墨西哥银元。”^⑦相

① 《福建龙溪县民林拨因兑换银钱纠纷致伤赵深渊身死案》(嘉庆十六年九月),杜家骥编:《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辑刊》,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644页。

② 杨国祯:《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6—169页。

③ A. Piatt Andrew, "The End of the Mexican Dollar",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8, No. 3, 1904, p. 338.

④ A. Piatt Andrew, "The End of the Mexican Dollar",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8, No. 3, 1904, pp. 321—356.

⑤ Akinobu Kuroda, "The Maria Theresa Dollar in the Early Twentieth-century Red Sea Region: A Complementary Interface between Multiple Markets", *Financial History Review*, Vol. 14, No. 1, 2007, pp. 89—110.

⑥ Joseph Edkins, *Chinese Currency*,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01, p. 65.

⑦ Gerard Vissering, *On Chinese Currency: Preliminary Remarks about the Monetary Reform in China*, Amsterdam: J. H. De Bussy, 1912, p. 152.

当清楚的是,银元的价值不是基于内在的实际含银量,而是由个别行业需求决定的。西班牙银元升值可追溯到19世纪中叶。^① 值得密切注意的是,特定银元受欢迎的现象带有很强的地域性特征。^② 历史上,特定商品往往与特定货币配对,我称之为通货回路。外国银元在近代中国流通是通货回路的典型案例。^③ 在某一通货回路内,商人毫不犹豫地会接受某种银元,不过当商人与回路外的商人交易时,那种银元的价值就必然按当地的虚银两估值。

从事远距离交易买卖某种特定商品的商人,都会使用同一种货币结账。例如,晚至20世纪10年代,安徽芜湖的米商仍使用停铸已久的西班牙银元进行买卖。整个19世纪,即使西班牙银元不再流通,长江下游地区向广东输出大量稻米,仍以西班牙银元记账。江西九江的景德镇瓷器是以墨西哥银元成交,赣西吉安棉纺织品则用日本银元买卖。墨西哥银元主要经由九江往返上海和地处内陆的景德镇;日本银元则从包括厦门的福建沿海地区流入赣南,再经九江流进上海,最终回流到厦门。由此,景德镇瓷器得以运入上海,赣南吉安棉布则售往福建,上海的煤油经九江销往赣南。由此可见,中国多地都出现了特定商品与特定货币相结合的情形。虽然历史上通货回路是不同货币制度的共同特点,但其在19世纪的中国经济中尤其显著。^④

自20世纪10年代中期起,中国银元在全国迅速盛行。1924年,估计有9.6亿枚银币在中国流通,其中有7.5亿枚是袁世凯银元,3000万枚是外国银元,余下的是其他中国银元。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对欧贸易萧条,曾在商贸中主导银元应用的墨西哥银元失去了主币地位,这个转变在墨西哥停铸银元和引进金本位前已出现。以汉口为中心的广大地区一向偏爱铜钱,但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改用银元,可见停用铜钱交易也让中国银元更加盛行。^⑤ 除了外国银元被取代、偏好铜钱的地区陆续消失,袁世凯银元的盛行与主要银行发行的钞票流通市面也有密切联系。上海棉厂的发展增加了对原棉的需求,原本流通于长江下游地区的银元,渗入种植棉花的长江中游地区。袁世凯银元普及开来,正因为它是被用于支付棉农的货币,而能够兑换袁世凯银元的钞票也不断扩展其流通范围。20世纪20年代中期,郑州等城市的原棉交易已普遍接受由中国银行等发行的钞票。

与银元日渐普及相反,称重银币慢慢消失。1924年对中国各城市使用国内钞票和通货的调查显示,很多城市已不再流通银锭,也不再使用当地的银两。例如山东益都以往会使用青平银,后来改用上海两为主导的用银方式;苏州亦然。^⑥ 苏州当地特有的银两补水纹,只是供商人在账簿转账时使用。^⑦ 1933年全国废两改元前,不仅在上海等主要通商港口,计枚核值的银元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1935年11月4日,国民政府宣布以中央、中国、交通等银行发行的法币取代所有现行货币,包括银元在内所有用作货币的金属都应该兑换成法币,归中央政府所有。因此,从货币制度层面来考虑,银元在中国货币史上占主导地位仅有短短两年。

结 语

当前文引述的艾约瑟要汇款给在中国内陆传道的传教士时,曾认真与中国的货币制度搏斗了一

① 关于西班牙银元升值,亦见 Richard von Glahn, "Foreign Silver Coins in the Market Culture of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4, No. 1, 2007, pp. 51-78.

② 黒田明伸『中華帝国の構造と世界経済』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4年,111-113页。

③ 关于通货回路的概念,见 Akinobu Kuroda, "Concurrent But Non-integrable Currency Circuits: 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 among Monies in Modern China and Other Regions", *Financial History Review*, Vol. 15, No. 1, 2008, pp. 17-36.

④ Akinobu Kuroda, "Concurrent But Non-integrable Currency Circuits: 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 among Monies in Modern China and Other Regions", *Financial History Review*, Vol. 15, No. 1, 2008, pp. 17-36.

⑤ Akinobu Kuroda, "The Collapse of the Chinese Imperial Monetary System", in Kaoru Sugihara ed., *Japan, China and the Growth of the Asian International Economy 1850-194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14.

⑥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国内汇兑处编:《国内商业汇兑要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25年印行,第295页。

⑦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国内汇兑处编:《国内商业汇兑要览》,第59页。

番。对他而言,在中国用钱“令人非常烦恼”,所以毫不犹豫将当时的货币情况形容为混乱奇怪。不过,就连艾约瑟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人似乎不为这些状况困扰。^① 在不假定标准化银币应该用作交易媒介的情况下,中国历史上的用银方式其实有其优点。首先,中国不会像其他文明一样,因银币品质降低而经历物价高涨的情况,称重用银使得中国人免受此苦。其次,同一城镇的商贾凭藉虚拟的白银单位,通过账簿之间的相互结算系统,省却使用现金的麻烦。第三,地方市场由铜钱而非银币主导,正好稳定当地物价,免受区外动荡局势影响。

本地交易独立于跨地域交易的情况,其倾向从内陆汇率的激烈浮动显露出来。根据一般认知,两个城市间的汇率一定在银的运费内起伏浮动。中国的情况却经常是汇率跌破或超过现银运费点。譬如,若将上海和重庆之间运送1 000两银的费用17两计算在内,1 000上海两相当于950重庆两的平价之下,两地汇率就应该介乎于933至967重庆两之间浮动;然而,事实上的汇率经常低于933两,如1919年10月1日的汇率就低至908两。^② 又如温州和上海之间的情况,运送1 000银元花费4银元;一到茶叶出口季节,汇率就下跌至984银元。^③ 这些现象支持了一种说法,即一次性交易的首要地位大大提高了对现金的需求。^④

显然有利必有弊,有人认为货币的去中心化结构妨碍国家层面的资本累积,又有人争论依赖一次性交易会限制长期性资本投资。不论把重点聚焦在优点还是缺点,中国的货币史(特别是称量银的制度)说明货币和市场并非只是单线条发展,而是按着各种条件以多元方式不断改变。

Transformation of Silver Usage in Chinese Monetary History: Silers Cut, Weighed and Booked

Akinobu Kuroda

Abstract: Silver by weight system in China, *yinliang*, originated from supplementary role for silk which worked as device for distant exchange in early Chinese empire. The Yuan issued state paper money which had face values in copper coin but was calculated in silver by weight. The introduction of silver by weight to tax collection by the Ming happened to bring to Chinese society the usage of silver pieces even for local exchanges of daily necessities after the huge influx of silver from Japan and South America in exchange of silk, porcelain and, later, tea. Supply of huge quantity of copper coins, Qianlong Tongbao, in the mid eighteenth century caused silver usages to retreat from local transactions and established a complementary structure between copper coins for local transactions and silver ingots for distant exchanges. Unlike modern common sense, the unfixed relationship between silver and copper coin and the imaginary unit of silver by weight for book transfers among local merchants brought a stability to local economies against turbulent interregional trade.

Key Words: Silver by Weight, Silk, State Paper Money, Copper Coins

(责任编辑:丰若非)

① Eduard Kann, *The Currencies of China: An Investigation of Silver and Gold Transactions Affecting China; With a Section on Copper*, Shanghai: Kelly and Welsh, 1926, pp. 416–417.

② 外務省通商局编『通商公報』第588号,外務省通商局,1919年,219–220頁。

③ 外務省通商局编『通商公報』第573号,外務省通商局,1918年,984頁。

④ 有关一次性交易在中国经济的首要地位,见 Akinobu Kuroda, “Strategic Peasant and Autonomous Local Market: Revisiting the Rural Economy in Moder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15, No. 2, 2018, pp. 195–227.